

《晏子春秋》与中国古代伦理秩序

刘晓川

《晏子春秋》是记录春秋后期齐国贤臣晏婴言行事迹的专著。晏婴仕齐灵公、齐庄公、齐景公长达五十余年,促使齐国在诸侯纷争的年代仍然长期处于相对兴盛的地位。《晏子春秋》所著内容集中彰显了晏婴尽礼行忠、以民为本、为政以德、躬行节俭的家国情怀。

尽忠职守 尽忠国家

“礼”是古代社会“五常”伦理价值规范之一,是社会共同遵守的秩序法则,是维系社会政治秩序的制度规范。晏婴认为,人之所以高贵,就是因为有礼,因为守礼实现了家庭、社会中的长幼有序、父子有别、上下分明。晏婴特别推崇周礼,强调要以礼治国,用礼来规范伦理秩序。他认为,在礼的规范中,大夫的施恩不应普及全国,民众不懈怠,财货不转移,工商不改行,士人不虚浮,官吏不僭越,大夫不收取公室之利。据《晏子春秋》记载,有一次,齐景公想与晏婴免除礼节来欢畅共饮,但晏婴认为,“礼”对朝廷秩序有着约束作用,如果大夫不讲“礼”,下面的官员就会效仿而变得不恭敬,因而也就无法做到尽忠职守、尽忠国家。

由此可见,作为一名臣子,晏婴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“尽礼行忠”的忠臣。对此,晏婴曾曰:“故忠臣也者,能纳善于君,不能与君陷于难。”即忠臣就是能给君主进献良言善策,不能和君王一起陷于危难。《晏子春秋》所论述的“忠”,不局限于忠于君主,更多地表达了忠于国家、社稷的思想意涵。那么,忠臣之行应该是什么样的呢?对此,晏婴认为,忠臣应该直言进谏,选拔贤人而用之,衡量自己的德行从而担任适当的官职,并获

取与自己能力相匹配的俸禄,看到贤于自己的人要学会让贤,不以官位高低作为自己待人的准则,也不以官位高低作为尽忠的标准,对待下属不苛刻,对待上级不阿谀奉承。

以民为本 爱民乐民

民,事之本也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是为政以德的立论基础,其核心要义是重视百姓疾苦,并做到爱民之所爱、乐民之所乐。为政者只有恪守以民为本的理念,注重维护百姓利益,处理好官与民、权与民的关系,才不会失去人格道义,才能维护国家稳定。早在西周时期,统治者就提出了利民为本的治国思想。《晏子春秋》贯穿着以民为本的大量论述,包含了晏婴对官民、权民关系的深切思考。

晏婴生活的时代正值春秋晚期,伴随着土地私有化发展和宗法关系的减弱,以及外部压力的减轻,致使对各国君主和官吏权力的约束监督相对减弱,进而造成各国君主和贵族苛责于民、劳役百姓。对此,晋国大夫叔向曾向晏婴请教为政者的治国思想和行为问题。晏婴回答说,最高尚的思想是爱护百姓,最深厚的行为是使百姓快乐,最卑下的思想是苛刻待民;地位卑下而不失去尊贵的德行,委曲求全而不失去正直的品格,“以民为本也”。

作为齐国重臣,晏婴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了以民为本、爱民乐民核心理念,而且在实践中处处彰显着惠民、利民、养民的政治操行。据《晏子春秋》记载,有一次,齐景公为了扩大晏婴的住宅条件,借晏婴出使鲁国之际,把晏婴邻居的住宅拆了。晏婴得知后说,为了扩大自己的住宅而侵犯邻居的利益,违背民心。晏婴坚决不居住,并恢复邻居原来的住宅,奉守不损害百姓利益的准则。

以民为本,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百姓的物质需求——粮食,这在农耕时代尤其如此。而要满足百姓的粮食需要,关键在于保障不误农时。据《晏子春秋》记载,在农收时节,齐景公为追求逸乐,役使大批民工兴建长康台。有一次恰逢齐景公举办大型饮宴,晏婴虽在旁边陪侍,但心里始终牵挂着无法回家收获的民工。当酒过三巡时,晏婴离开席位,边舞边唱道:庄稼结穗而不能收获,秋风吹来全部凋落,风吹雨打全部飘散,上天无情,不让民活。晏婴唱完,潸然泪下。酒酣耳热的齐景公明白了晏婴的深意,于是下令停止工程,民工得以回家收粮。

廉洁清正 为政以德

廉者,政之本也。官德是为政者最基本的品格要求和道德规范,体现了为官者道德修养的主体自觉和慎独的自律极致,与治世安邦息息相关。《晏子春秋》所蕴含的廉洁清正、为政以德的政治智慧以以德治吏、良吏治国为主线。

那么,到底什么是官德呢?齐景公与晏婴关于社稷之臣、善为国家等问答,折射出晏婴对这一问题的独到思考。齐景公问晏子,对于国君而言需要什么样的臣子?晏婴答曰:所谓国家大臣,就是能够稳固国家,分清君臣上下之礼。齐景公又问,如何发现治国的贤人名士呢?晏婴答曰:评判贤人名士,要通过观察他的行为作出评价,而不是根据华丽的言辞作出判断。

晏婴在为官期间,始终以廉洁清正为本,心怀清正廉洁之心,坚守道德情操,不随波逐流,是讲官德、重官德、守官德的楷模。齐国相国庆封

由于专权遭到众大夫的攻击而逃亡,人们瓜分他的财产并提议把邶殿分给晏婴作食邑。晏婴坚决不接受,认为人人都想生活优裕,但对财富既不能废弃减损,也不能任意无度。在他告老还乡时,主动提出要把封邑还给齐景公,齐景公认为这没有先例,不同意晏子的提议。晏婴说,品德厚重而接受俸禄,是为了体现主上的圣明;品德微薄而退还俸禄,是为了使臣下廉洁。在晏婴看来,自己年老德薄主动把封邑退还给齐景公,这是他廉洁清正的表现。

俭以养德 躬行节俭

齐国建国之初,特别是到齐桓公时期,由于采取了有力的改革举措,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。然而,伴随着物质财富的大量积累,齐国的奢靡腐化之风也开始盛行,到齐景公时期尤为如此。《晏子春秋》不仅多处论述了齐景公嗜酒享乐、华衣美食、大兴土木的奢靡生活,而且贯穿着晏婴对俭以养德的清醒认识。

晏婴认为,只有君主约束自己、节俭为政,才能减轻百姓负担,赢得民心。面对齐景公奢为宫室、广为台榭、丰乐侈游与百姓衣不蔽体、食不果腹形成的鲜明对比,晏婴极力劝谏齐景公厉行节俭。据《晏子春秋》记载,齐景公问晏婴:我想穿上圣贤之王的服饰,居住圣贤之王的房子,这样各国诸侯会来归附吗?晏婴答道:效法他们的节俭是可以的,如果只是效法他们的服饰房子,就没什么好处。齐景公又问晏婴,作为君王,身份尊贵百姓安定,这样困难呢,还是容易?晏婴回答说,作为君王,节制自己日常的开支,其余的用以照顾百姓,这样就自身尊贵而且百姓安定。

晏婴在劝谏齐景公的同时,更是身体力行、躬行一生。据《晏子春秋》记载,作为相国,晏婴吃的是粗粮淡饭,菜肴也比较简单平常,连齐景公都感到过意不去。晏婴却不以为意,觉得不仅能吃饱肚子,还能有荤菜、素菜的搭配,已经很满足了。他一再婉拒齐景公赐予的封邑、千金、狐裘、宅第、市租、乘马等,成为百官表率。

(转自《学习时报》)

三纸无驴

刘琪瑞

南北朝时期的学者颜之推撰写的《颜氏家训》是中国家训史上的重要著作,里面谈了很多教人读书写文章的道理。其中《勉学》篇有这样一句:“邺下谚曰:博士买驴,书券三纸,未有驴字。”说的是邺城这地方,有个熟读四书五经的博士,要到集市上去买驴,这可是一笔大买卖,得立下契约才行。付完钱后,博士要求卖驴人写一份契约,卖驴人不识字,请博士代写。他洋洋洒洒写了三页纸,都没提到应该写的“驴”字。卖驴人等得不耐烦,轻蔑地说:“你只要写上某年某月某日,我卖了一头驴子给你,收你多少钱,不就完了?干吗还没完没了写了整整三张纸?”围观的人哄笑不已,博士也自觉没趣,忙牵着毛驴灰溜溜地走了。颜之推举这个例子,是

希望自己的后代不要效仿当时流行的文风,“问一言辄酬数百,择其指归,或无要会”,“使汝以为师,令人气塞”。

北宋初年有一个叫赵邻几的文臣,担任过秘书省校书郎、直史馆、知制诰等职。他自幼好学,知识渊博,善写文章,每次构思,必正襟危坐,一下笔就数千言。他写的文章对仗工整,结构缜密,受同辈人推崇。他曾作《禹别九州赋》,长万余言,时人争相传诵。但这位文章老手,在担任为朝廷起草文书的知制诰时,却表现不佳,《宋史》说他“及掌诰命,颇繁富冗长,不达体要,无称职之誉”。赵邻几写的公文,篇幅冗长,文辞累赘,不符合文体要求,是个不称职的秘书,他把写赋的才能运用到写公文上,写赋要求铺张扬厉,而公文要求简明准确。

明代一位叫茹太素的官员,也犯了与赵邻几同样的错误,他的遭遇就更加曲折了。明代天启年间官修的《礼部志稿》中,记载的一则掌故颇为有趣:明代洪武年间担任刑部主事的茹太素,每次上奏章动辄七八千字乃至万言,且语意艰涩,明太祖朱元璋每看他的奏章都头疼。洪武九年(1376年),茹太素上了一份陈时务书,足足有17000字,因为篇幅太长,朱元璋懒得看他的奏章,让别人念给他听,读了很长一段时间,还没听出个所以然来。朱元璋大怒,令人将茹太素杖打了一顿,随即下令:“虚词失实,巧文乱真,朕甚厌之,自今有以繁文出入朝廷者,罪之。”

第二天,朱元璋又想起茹太素的奏折,耐着性子听完了余下的部分,认为奏折最后提出的五条建议还是不

错的,朱元璋采纳了其中四条。明明五百字就能把问题说清,茹太素非要洋洋万言,误时误事。有鉴于此,朱元璋大力革新文风,命令中书省制定了行政文书规范颁发给官员,“俾陈得失者无繁文”。

赵邻几、茹太素都是文采不俗之人,所以下笔千言对他们不是难事,但不分场合地炫耀文采、炮制长文,则体现出他们缺乏文体意识。不同的场合要使用不同的文体,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写作规范,古人对此十分讲究,魏晋南北朝时代,已出现了“奏议宜雅,书论宜理,铭诔尚实,诗赋欲丽”的说法,后来对文体的辨别更加明晰。写文章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,宜简明平实,直击要害,若是千言万语才进入正题,早已错过解决实际问题的时机了。

(转自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)